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3), 283-288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6.143040

Hans汉斯

空间批评视角下《到十九号房间去》中的女性困境

刁凡彧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6年3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4日

摘　要

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到十九号房间去》以中产阶级女性苏珊的悲剧命运为主线，呈现女性个体在现代家庭与社会空间中的困境。文章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从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维度对文本进行分析，探究苏珊在自我规训与追求解放之间的撕裂状态。文章认为，三个空间维度的相互交织共同挤压着苏珊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存可能，其悲剧折射出欧洲二十世纪中叶女性在父权话语下面临的普遍困境，引发对性别与主体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

多丽丝·莱辛，《到十九号房间去》，空间批评，列斐伏尔

Female Predicament in *To Room Ninet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Criticism

Fanyu Di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ch 17, 2026; accepted: May 28, 2026; published: June 4, 2026

Abstract

Doris Lessing's short story *To Room Nineteen* takes the tragic fate of Susan, a middle-class woman, as its main narrative thread, and presents the predicament of female individuals within the spaces of modern family and society. By employing Henri Lefebvre's three-dimensional dialecti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xt from three dimensions, physical space, ment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and explores the torn state of Susan's self between discipline and the pursuit of liberation. It argues that the interweaving of these three spatial dimensions jointly restricts the existential possibilities of

文章引用: 刁凡彧. 空间批评视角下《到十九号房间去》中的女性困境[J].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3): 283-288.
DOI: 10.12677/wls.2026.143040

Susan as an independent individual. Her tragedy reflects the universal plight of women in mid-20th-century Europe under patriarchal discourse, and provokes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issues of gender and subjectivity.

Keywords

Doris Lessing, *To Room Nineteen*, Spatial Criticism, Henri Lefebv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到十九号房间去》(*To Room Nineteen*)是英国作家、200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极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之一，收录于创作时间横跨二十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的同名短篇小说集《到十九号房间去》中。小说以二十世纪中叶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为背景，讲述女主人公苏珊·罗林斯(Susan Rawlings)在看似美满的婚姻中逐渐陷入精神危机的过程。苏珊与丈夫马修(Matthew)是旁人眼中的完美夫妇，育有四名子女，住在伦敦近郊一座花园洋房。然而，正是在这理想空间的内部，苏珊日益体验到空洞与自我剥离感。她先后尝试在家中花园独处、短暂租用旅馆房间、独自度假旅行，试图为自己找寻一处精神栖居地，却屡屡失败。最终，她在廉价的“弗雷德旅馆”租下十九号房间作为仅存的精神避难所。然而，当丈夫马修发现了这个空间并基于理性逻辑误判她出轨时，苏珊为守护这最后的私密领域，被迫谎称有情夫，并在真相无法被理解的绝境中，在十九号房间内决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用冷峻克制的叙事呈现了个体自我如何在高度秩序化的现代家庭与社会空间中无处容身、步步退守直至自我湮灭的过程，并引发读者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环境下性别与主体性问题的思考。

当前学界对《到十九号房间去》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早期研究多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探讨苏珊作为中产阶级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的自我迷失问题，将小说视为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批判[1]。近年来，空间批评视角逐渐成为解读该作品的重要路径之一。有学者从空间叙事角度分析苏珊从花园洋房到十九号房间的空间转换轨迹，指出空间的逐层退缩构成了其悲剧命运的主要叙事动力[2]。然而，既有研究虽已触及空间维度，但多聚焦于空间转换的表层叙事功能，对于系统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对文本进行深入剖析的研究仍然较为缺乏。

人类对空间本体的追问在柏拉图笔下就已有记载。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再到近代认识论转向及至当代批判理论，空间这一概念始终是西方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3]。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空间转向”(the spatial turn)，这一思潮不再像传统观念一样认为空间只是静止与中性的，而是将其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和与权力运作的地点。2002 年，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 Wegner)在题为《空间批评：地理、空间、地点和文本性批评》(Spat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Textuality)的论文中正式提出“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这一术语，用来指代空间转向浪潮中聚焦文本空间维度的文学研究范式[4]。作为这一理论转向的奠基性人物，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于 1974 年出版了《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该书被认为是空间理论的里程碑式著作。列斐伏尔将空间从几何学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以社会生产为核心的存在论地位。他认为空间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也反过来生产和再生产着社会关系本身。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空间三元辩证法”(the triadic model of space)，即社会空间由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与表征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三重维度辩证交织而成。其一，空间实践是可感知的空间维度，指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行为、移动轨迹与物质环境的使用方式，这一维度保障着社会结构的连续性与再生产。其二，空间表征是构想性的空间维度，是“科学家、设计师、城市学家、各种政治技术专家、社会工程师们的空间，是艺术精神与科学思想相结合的特定类型的空间”。其三，表征性空间是亲历性的空间维度，承载着个体文化经验。同时，它也调节着其他两个维度并且使这些维度成为连贯的整体[5]。基于此，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研究需要涵盖物质的、精神的以及社会的这三种领域。这三者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交织的有机整体，每一维度都内嵌于其他维度之中。

本文将从空间批评理论的视角出发，重点依托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分别从物理空间、心理空间以及社会空间对《到十九号房间去》进行剖析，探究这三种空间维度如何在该文本中交织、产生冲突并最终导致女主人公苏珊的个体毁灭。苏珊不断追寻自由却最终失败的困境也引发了读者对父权话语下女性个体内在空间受到挤压这一现象的思考。

2. 物理空间：退让的领地

列斐伏尔认为我们首要关注的领域是物理领域，即自然和宇宙[5]。在空间三元辩证法中，物理空间涉及可感知的、物质性的空间形态。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直接接触、使用和穿行的场所，是建筑、街道、房间等实体环境构成的具象化世界。这些空间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到，尤其是被人们的眼睛“看到”，因此具有明显的视觉特征[6]。小说通过构建花园洋房、“妈妈的房间”、汤森德小姐的旅馆、威尔士的山谷以及弗雷德旅馆的十九号房间等主要物理空间，展现女主角苏珊丧失独立自我及其试图重新找寻自我的过程，从而揭示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主体意识被多重元素所压制。

苏珊与丈夫的婚姻看似幸福美满，二人的物质生活非常富足，婚后他们购置了一幢带花园的洋房以便孕育子女，在此后十年间这里是苏珊的主要生活场所。前期苏珊认同并接纳自己作为妻子与母亲的身份，随着丈夫出轨与孩子们长大“脱手”，她开始对传统家庭身份产生动摇。苏珊每天在家中料理家务、照顾子女、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尽管这所住宅宽敞又体面，但洋房内部并未为她留出真正属于个人的角落。当苏珊产生独处需求时，她只能独自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然而，这一场所并未真正隔绝家庭生活的介入，例如女佣帕克斯太太随时会因为家务琐事前来请示报告，使苏珊的私人时刻不断被打断与监视。对于苏珊来说，“她一点都不喜欢在花园里待，因为那里和那个敌人离得很近”[7]。在花园洋房中，苏珊的个人领域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家人为回应苏珊的独立需求，为她专门设立了“妈妈的房间”。这里原本是孩子们的游戏室，经改造后成为苏珊的专属区域。然而这里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私密空间，实际上仍然是家庭空间的延伸。她像被“囚禁”一样如坐针毡，内心的自我迷失感更加强烈，心中浮现出空虚、不安、焦虑等“魔鬼”，这些都预示着苏珊迷失了准确的自我定位[8]。

当家庭内部已无法提供有效的独处空间，苏珊开始将目光投向洋房之外的公共空间。从城市旅馆到自然山谷，她在公共领域寻找容身之所的尝试始终未能真正实现。一方面，她不断受制于父权话语的规训，公共观念审视下一位中产阶级女性独自开房属于行为失当；另一方面，苏珊始终在遵循与抵制父权意识塑造的道德自我之间徘徊。她试图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的理性压抑对自由的渴望，认为自己追求独处的念头是“疯了”，这种自我规训在丈夫马修那里得到强化，进一步加深了她对自身需求的质疑。这一系列尝试的失败表明，苏珊的困境不仅源于具体空间的压迫性，更植根于父权话语对女性行为、情感与欲望的全面规约，以及这种规约在个体内部形成的内在分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苏珊最终走向了弗雷德旅馆的十九号房间。这间位于破败街区的狭小、廉价的房间陈设简陋，但苏珊却暂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她每周来这里三天，从上午十点待到下午六点，

在房间里静坐或躺卧，偶尔阅读。与之前任何一个空间相比，十九号房间位于完全陌生的环境，与此前一切没有任何交集。和奢华的洋房相比，“这个房间变得更是她的了”[7]。然而这种自由仍然是短暂的，当丈夫发现这一空间并误判她出轨时，苏珊为守护这最后的私密领域，被迫用谎言掩盖真相，最终在十九号房间内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花园洋房到十九号房间，苏珊所占据的物理空间呈现出明确的收缩轨迹。空间面积从大变小，位置从中心到边缘，性质从公开到私密。在小说中的众多空间中只有十九号房间真正属于苏珊，而最终依然被侵蚀与破坏。由此可见只寻求转变物理空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苏珊的问题，她一直在试图逃离，而到最后终于无路可逃，这也让她最终选择了死亡这一获得自由的方式。面对自我主体性丧失的困境，单纯依靠物理空间只能短暂缓解，更重要的是从心理层面上构建独立空间和自我认同。

3. 心理空间：撕裂的内心

心理空间在物理空间的基础上生成，却又超越物理形态的限定。这一空间维度在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起调节作用，并将三个维度凝聚成连贯的整体[9]。心理空间承载着个体的情感、记忆与欲望，同时也是主体对自身处境进行内化感知的意识场所。《到十九号房间去》全文采用第三人称有限的全知视角，聚焦苏珊的心理活动，并借助内心独白和意识流手法，展现她在多重身份挤压之下逐渐迷失自我的精神历程。

在婚姻生活初期，苏珊对自我身份持认同态度。她顺应传统角色，认可自己在花园洋房中作为妻子与母亲的职责，三层空间之间保持着表面上的协调。然而，随着丈夫出轨以及子女日渐长大，苏珊开始察觉到内心的空洞。文中多次出现“魔鬼”这一意向，从“不管那敌人是什么”到“一个发色姜黄、体力充沛的男人，穿一件发红的、触感不佳的毛外套”[7]，“魔鬼”呈现逐步具象化的趋势。这一意象并非真实存在，而是苏珊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在心理空间中的投射，体现着她对自由与主体性的潜在渴望。当她试图对丈夫表达内心的不适时，却因担忧不被理解而选择隐瞒，仅以身体不适搪塞。马修虽尝试满足妻子的表层需求，例如设立“妈妈的房间”、同意妻子独自去威尔士度假等，却始终将她的不安情绪解释为需要治疗的“病症”。双重挤压促使苏珊认为自身对自由的渴望是不合理的，自己必须像忍受胳膊残疾、口吃或耳聋一样接受这种状态[7]。丈夫的误解进一步强化了自我规训，使她在遵循与抵制父权道德之间反复摇摆。苏珊和子女的情感联系也经历着心理层面的疏离。随着苏珊对自由的渴望越来越强烈，陪伴孩子们逐渐变成一种煎熬，她会情绪失控，会刻意缺席家庭生活。她下意识说出“脱手”和“约束”，却又觉得自己这样想是愚蠢的。孩子们在门外喊着“妈妈”，她却不作回应，同时感到愧疚[7]。这种内心刻画揭示出“母亲”这一角色在她的心理空间中已从责任转变为负担。此外，寄宿帮工索菲到来后，母亲与女主人的职责被全权接管，苏珊在心理上进一步从家庭轴心退出，扮演一个局外人的角色。

心理空间与外部世界不断割裂，苏珊对自己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认同感逐渐瓦解，反之转变为对自己作为自己本身的向往。她不再是孩子的母亲、马修的妻子、帕克斯太太和索菲的雇主、那座大房子的女主人，她是琼斯太太，“她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7]。外部空间的挤压与自身内在矛盾共同构成了这一困境，她既试图反抗规约，又不断将社会期待内化为对自己的审判。这种内外交织的张力构成了苏珊悲剧的深层逻辑，也使这一人物形象超出了单一受害者的叙事，从而呈现出复杂性。

综上所述，苏珊心理空间的演变轨迹总体呈现出从统一到分裂、从表达到封闭的递进逻辑。她将追求自由的渴望诊断为病态，借助“魔鬼”意象投射被压抑的自我意识，最终在心理层面上彻底退出家庭。这一过程表明心理空间持续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产生作用，父权话语通过丈夫的不理解、社会对女性的刻板期待等方式渗透进苏珊的内心，形成自我规训与渴望解放之间的分裂。正是这种内在分裂构成了苏珊精神困境的本质，并最终将她推向毁灭性结局。

4. 社会空间：无形的规训

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性的产品[5]，同时它也是包含着前两类空间，彻底开放、充满想象的空间[9]。它既是社会关系赖以存在的场所，也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各种社会关系通过不同性质和等级的空间形式被固定下来后，统治权力便在这些空间中持续发挥作用。在《到十九号房间去》中，从传统婚姻对夫妻关系的界定，到中产阶级家庭观念对女性职责的预设，再到社会舆论对“正常”女性行为的审判。这些规则体系共同构成苏珊生存的社会空间，塑造着她作为妻子与母亲的身份认同，也在其试图打破时持续施压。

小说中苏珊与外界建立的人际关系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婚前与同事朋友的关系以及婚后与女佣和旅馆老板的关系。苏珊婚前曾就职于一家广告公司，并因能力出色深受领导和同事们的赏识，这份工作赋予她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认同，苏珊甚至拥有属于自己的公寓。然而婚姻使其逐渐退出工作领域，生育后她辞去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家庭，自己原本的社会交往随之结束。婚后，苏珊的社交圈主要局限于夫妻共同的朋友。在这个圈子里，朋友们的反应是她确认自我身份的重要参照。聚会中大家对这对“完美夫妇”的羡慕和赞叹强化了她对妻子角色的认同，然而这种认同并非处于他和马修之间的爱情，而是基于社会对婚姻的传统期待，正如朋友们所感受到的那样，“这个平衡、理性的家庭只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它们能准确无误地有意识地做正确的选择”[7]。亲朋好友的看法在她身份建构初期发挥着潜在引导作用，同时也导致了后期内心陷入矛盾。

当苏珊开始感到精神压抑并尝试寻求独处空间时，外部世界再次以新的形式介入她的生活。汤森德小姐的旅馆是她首次将活动范围拓展至家庭之外的场所，然而身为女性的旅馆经营者汤森德并无法理解和共情苏珊。在汤森德看来，苏珊拥有体面的丈夫、宽敞的洋房、孩子们和女佣，物质生活应有尽有，过着旁人羡慕的生活。而这一判断正是依据当时社会对中产阶级女性应有生活的普遍想象，传统性别观念通过这位女性中介得以传递，使苏珊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困境无法在外部世界获得理解。当她再次做出尝试时，精明的旅馆老板弗雷德为苏珊提供了短暂的身份重构空间。在这里，她得以暂时摆脱社会赋予她的多重角色，体验到“绝对孤独”的自由。然而，父权话语仍在通过男性视角对其进行审判，弗雷德虽拿钱办事，却“显然不喜欢她到这里来”[7]。当私家侦探来打探消息时，他立刻放弃将实情全盘托出，致使丈夫误以为苏珊有不忠行为。“她明白了，他希望她真的有一个情人”[7]，在丈夫看来，她对自由的追寻甚至比婚外情更加令人无法接受，这也推动了苏珊加快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苏珊逐渐发现自己向往的自由与整个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她无法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无法让他人理解自己的精神困境。当内心需求无法被外部世界接纳，她最终选择在十九号房间打开煤气，以死亡作为最后的解脱。

5. 结语

多丽丝·莱辛的《到十九号房间去》通过女主人公苏珊的悲剧命运，呈现出现代社会中女性个体自我与外部空间之间的深刻冲突。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从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维度对小说进行解读，揭示了空间在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中的核心作用。从花园洋房到十九号房间，苏珊所占据的物理空间逐步缩小与隐秘化；她的心理空间在自我规训与渴望解放之间反复撕裂，最终走向溃散；而社会空间通过性别角色与社会舆论等规范性力量，持续挤压着她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存可能。三个空间维度相互交织、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苏珊的困境。通过对这些空间维度的考察，得以看出苏珊的悲剧超越了个体命运的范畴，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女性在传统性别角色期待下面临的困境。而苏珊拥有的物质条件使其精神困境表现为一种富足中的空虚，这与同时期工人阶级女性的生存压力存在差异。三种空间维度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苏珊的悲剧，也揭示了空间对女性主体性的结构性

限制，引发读者对性别与主体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 刘春艳, 李珮尧. 母职意识形态禁锢与心灵戕害下的女性献祭者人物塑造——对多丽丝·莱辛《到第十九号房间》的女性主义解读[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 35(5): 42-43.

[2] 张红芳. 空间·叙事·存在——《到十九号房间》的空间诗学[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3(4): 102-105.

[3] 陆扬. 从空间观念稽考到空间批评理论[J]. 文艺研究, 2021(6): 18-28.

[4] 菲利普·韦格纳. 空间批评: 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M]//阎嘉. 文学理论精粹读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35-168.

[5]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3-7+22.

[6] 潘可礼. 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13-20.

[7] 多丽丝·莱辛. 到十九号房间去[M]. 杨振同,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8] 吕佳. 多丽丝·莱辛《到十九号房间去》的空间书写与身份迷失[J]. 名作欣赏, 2025(15): 158-160.

[9] 郑佰青. 西方文论关键词: 空间[J]. 外国文学, 2016(1): 89-97.